

认知警觉机制的研究与展望^{*}

陆蒙娜 范振强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310018)

提 要: 认知警觉机制理论发展自哲学、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和语言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可用于解读交际行为。自2010年被 Sperber 等正式提出以来,认知警觉机制在各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价值,显示出较强的解释力。本文通过介绍认知警觉机制、探讨认知警觉机制与关联理论的关系,论述认知警觉机制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旨在探究认知警觉机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对其在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以期扩大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

关键词: 认知警觉机制; 关联理论; 语言学; 研究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6-0047-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6.009

A Study and Prospects of Epistemic Vigilance

Lu Meng-na Fan Zhen-qia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Originated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cognitive psychology, social sciences and linguistics, the notion of epistemic vigilance is applicabl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cative acts. Since it was officially put forward by Sperber et al. in 2010, epistemic vigilance has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a wide range of fields, and it is proved to have a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Wit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epistemic vigilance,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stemic vigilance and relevance theory, to discuss its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to explore the justifiability and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onal values of epistemic vigilance.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epistemic vigilance theory will also be presented.

Key words: epistemic vigilance; relevance theory; linguistics; study and prospects

1 引言

由于涉及如交际双方、交际环境、认知背景等众多因素,所以交际行为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会话含义、面子理论、礼貌原则和关联理论等的提出都旨在解读交际行为。“根据关联理论,人类交际是一个互明的过程。”(孟建钢 2018: 88)但无论在何种情境下,交际产生的主要问题都源自交际者的利益和诚信,而非个人能力(Sperber et al. 2010: 2)。换言之,说话者如果有意为了自身利益而说假话,听话者很容易被误导或欺骗,从而导致交际中一方的利益受损,使交际无法保持健康稳定的状态。但在现实生活中,听话者往往能够发现说话者的真实意图,避免

因被误导而在交际中利益受损。这说明人类在交际过程中有某种认知机制保证他们不被有意或无意的误导,从而维护他们在交际中的利益。这种机制就是认知警觉机制(epistemic vigilance),是由一套认知机制构成的警觉能力(同上: 1)。

认知警觉概念于2009年由 Mascaro 和 Sperber 在《认知》(Cognition)期刊上首次提出。他们指出,孩童对于欺骗具有道德、认知和心智层面的警觉机制。2010年,Sperber 等在《思维与语言》期刊上正式提出认知警觉机制。他们认为,这种机制不仅有益于交际,更是人类交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提出至今,认知警觉机制引起国外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研究除了对认知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认知语用学视域下的刻意性隐喻研究”(16YJC740015)的阶段性成果。

警觉机制本体的研究外(Mascaró , Sperber 2009; Sperber et al. 2010; Cruz 2012; Origgì 2012; Michaelian 2013; Sperber 2013) ,还涉及该理论对二语习得(Cruz 2013) 、语用失误(Cruz 2014) 、双关语(Cruz 2015) 和话语分析(Hart 2011) 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另外 ,认知警觉机制受到社会认知科学(Origgì 2010; Miton , Mercier 2015) 、心理学(Jacquot et al. 2015; Castelain et al. 2015; Jaswal , Kondrad 2016) 以及社会学(Truong 2012 , Hendriks et al. 2016) 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目前 ,国外有关认知预警机制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势态 ,该机制被认为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较强的解释力。本文通过梳理该理论的一些关键议题 ,包括何为认知警觉机制 ,认知警觉机制与关联理论的关系以及认知警觉机制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等 ,对其未来的研究作出展望 ,以期扩大该理论的研究范围 ,扩展其研究视角。

2 认知警觉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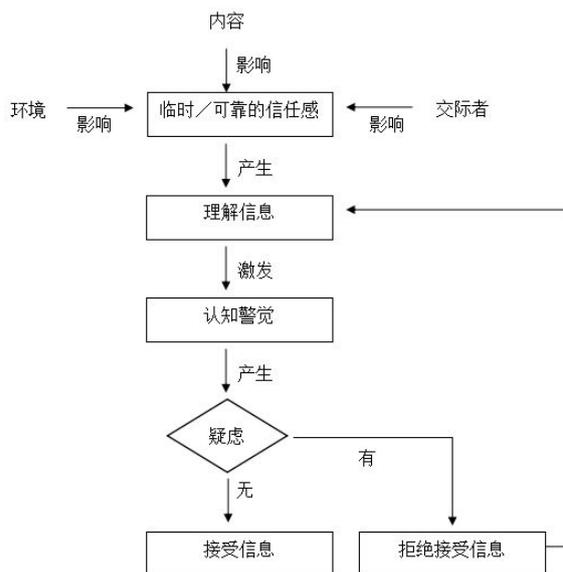
2.1 认知警觉机制的界定

人类的交际是有意图的交际 ,在很多情况下 ,说话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传递非真实信息。为此 ,听话者需要某种能力或机制来防范这些非真实信息 ,从而维护他们在交际中的利益 ,这种认知机制就是认知警觉机制。尽管人类交际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信任(trust) ,但警觉不是信任的对立面 ,而是盲目信任(blind trust) 的对立面(Sperber et al. 2010: 6) 。在大部分情况下 ,交际者的利益是通过误导和欺骗听话者得以实现的(同上: 2) 。一方面 ,尽管交际双方的利益经常重叠 ,但并非完全一致 ,所以这部分利益冲突会促使说话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传递出假的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另一方面 ,人类交际具有目的性这一特质导致交际双方的期待不同 ,说话者希望传达的信息在听话者身上产生一定的效果 ,故不在乎信息的真实性 ,而听话者往往期望得到真实的信息 ,所以听话者需要某种能力可以辨别所接收信息的可信度 ,这些因素证明认知警觉机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此外 ,Sperber 等认为 ,人类的警觉倾向可能和交际能力同时进化而来(同上: 3) 。因为尽管交际者有被误导或欺骗的风险 ,交际依旧广泛存在 ,这说明认知警觉与交际并存。如果失去认知警觉机制 ,交际双方的利益很难保持平衡 ,这容易导致交际失败。通过考查哲学、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问题、研究和理论 ,Sperber 等指出 ,人类的认知预警机制有助于促进

人类的相互信任 ,便于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信息(同上: 7) 。

2.2 认知警觉机制的运作方式

交际行为无非就是信息的传递 ,主要涉及到信息的理解和接受。Austin 和 Grice 学派的语言哲学家和语用学家认为 ,理解和接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有一定的联系。理解不一定是接受 ,但理解是接受的前提。根据 Sperber 等对交际行为的论述 ,产生理解的前提是听者对说话者、说话内容和说话环境等交际因素采取一种临时的、可靠的信任立场 ,即听者首先须要信任这次交际行为 ,才能理解话题(同上: 12 - 14) 。但即使理解话题 ,听者尚不能接受这个话题。因为认知警觉机制对话语进行筛选和考察 ,如果没有怀疑 ,听者就可以接受自己的解读 ,并接受话语;如果保留怀疑 ,听者就会选择不接受话语。此外 ,触发认知警觉和理解的行为被认为是同一种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acts) 。认知警觉机制的运作方式可用图₁ 表示:



图₁ 认知警觉机制的运作方式

2.3 认知警觉机制的功能和作用

认知警觉机制的提出旨在解释信息接收者如何减少被误导 ,特别是被欺骗的风险(Sperber 2013: 65) 。该机制有两项功能: (1) 检测涵盖说话者语用能力、善意和信息可靠性的心理模块(mental module) (Cruz 2012: 365) ; (2) 监测听话者在理解过程中采用的话语解读步骤、话语解读的潜能或实际结果以及可以促进理解的语用成分(同上: 366)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认知警觉机制不仅影响交际双方的说话策略和解读方式 ,最终

还会影响到听者能否接受说话者提供的信息以及能否信任说话者。

认知警觉机制的作用体现在维持交际发展的稳定性上,因为交际双方利益不受损是交际发展的前提。换言之,依靠认知警觉机制,说话者可以更好地影响听话者,听话者可以更好地地区别出错误信息,最终达到损益的平衡(cost-benefits balance)(Sperber 2013: 62)。如果听话者没有认知警觉机制,很有可能被欺骗或误导,利益随之在交际中受损。在这个过程中,听话者会失去对说话者的信任,进而拒绝接受说话者传递的信息,最终导致交际中止,但是交际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稳定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交际者具有警觉性,并且这种警觉机制推动交际的稳定发展。

2.4 认知警觉机制的分类

在宏观概念下,警觉机制可以分为社会警觉机制、心理警觉机制、认知警觉机制等种类。我们主要谈论认知警觉机制,根据认知警觉机制运作的方式和产生的效果等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其细分。根据认知警觉机制是否成功发现谎言,可以将其分为两类(Michaelian 2013: 40)。空警觉(bare vigilance)是信息接收者具有警觉性,因为他们会监测说话者的话语,并监测能否成功发现谎言;有效警觉(effective vigilance)是信息接收者具有警觉性,因为他们会监测说话者的话语,同时能够成功发现谎言。但是对于人类是否具有有效警觉机制,擅于发现谎言,Michaelian(2013: 41)和Sperber(2013: 64)存在分歧。

根据警觉的有效程度,可以将认知警觉机制继续分为3类(Michaelian 2013: 42)。强有效警觉(strong effective vigilance)是信息接收者采用空警觉,并借此避免被欺骗;中有效警觉(moderate effective vigilance)是信息接收者采用空警觉,并由于警觉机制和其他因素得以避免被欺骗;弱有效警觉(weak effective vigilance)是信息接收者采用空警觉,但主要是由于其他因素才得以避免被欺骗。Michaelian(2013: 42)认为,人们的警觉呈现弱有效性;而Sperber(2013: 64)则认为,人们的警觉呈中有效性。

当我们意识到话语中存在误导信息,须要采取警觉机制来过滤信息的时候,我们通常至少采用两种警觉态度(Origg 2010: 150-151)。(1)外部警觉(external vigilance)是对接受的信息采取认知警觉态度,试着提取认可的实践方式、原则等(如应该信任哪种规范,应该用怎样的试探法);将“有效的”实践方式和试探法与那些基于心理

偏见、权威的内在化规则、道德约束、情感反应而得出的实践方式和试探法区分开来。(2)内部警觉(internal vigilance)是将信任对象置于其出现的社会历史和系谱学以及其对认知生活的影响之中,对自我信任采取认知警觉态度。这份信任让人对可以催生偏见的理性、制度偏见和社会压力维持“批判性立场”的方式。比如当我问自己:“为什么人们会相信我说的话?”我就在对我的认知实践方式负责。

简言之,外部警觉机制受社会环境、文化规约、交际语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内部警觉机制受交际者采用的解读步骤、信任感、思维方式、认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场景下,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警觉措施。即使在同一情境中,每个人采取的警觉措施也会存在不同,我们的警觉程度取决于个人。说话者、交际环境、话语内容、认知环境、情感反应、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交际者的信任感。当一方认识到付出的信任存在危机时,便会对认知机制产生警觉性,进而选择重新审视、过滤接收的信息。

3 认知警觉机制与关联理论的关系

Sperber和Wilson(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试图解读听者如何正确理解说话者传递出的信息,为何听者做这番理解,并认为这就是说话者要表达的真正意义。关联理论将交际行为视为明示—推理的过程,传递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该理论主要有两个原则构成:认知关联原则和交际关联原则。前者认为人类认知倾向于最大关联;而后者假定每一次明示交际行为都具有最佳关联(Sperber, Wilson 1995: 158)。与Grice(1975)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不同,关联理论中的关联涉及语言的解码(decoding)和推理(inference),并贯穿交际理解全过程(Cruz 2012: 367)。在理解过程中,交际者需通过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才能实现最佳关联,从而实现有效互赢的沟通。但是,关联期待不是决定听者最终接受某种解读的唯一影响因素(Mazzarella 2013: 27, Cruz 2015: 1)。即使听者能实现最佳关联,做出某种解读,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解读并非说话者所要传递的信息。这时听者会自觉地进行新一轮解读,再次找寻最佳关联。事实上,在正常交际中,有意或无意的误导总不可避免。因此,在人们的认知机制中形成某种特定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说话者、信息来源以及认知过程是否值得信

任(Cruz 2012: 368),这种能力就是认知警觉能力。著名哲学家 Thomas Reid 曾说过,人类倾向于说实话并认为别人说的也是实话。同样,Tyler Burge,Ruth Millikan,Daniel Gilbert 等也做过类似的断言(Sperber 2013: 64)。一方面,说话者在通常情况下不敢说假话,因为听者具有警觉意识,一旦被听者发现是假话,说话者就会失去听者的信任,失去声誉,最终导致自己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听者首先要信任信息来源,才能相信他所做的具有最佳关联的解读正是说话者要表达的意义。换言之,有效的交际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种认知警觉机制在不断寻找最大交际效率的过程中得以形成。

与关联理论一样,认知警觉机制也是旨在解释人类的交际行为。关联理论认为,最佳关联决定听者是否应该接受某种解读,但是不能保证听者所做的解读是真实可靠的。因此需要认知警觉机制,这类机制可以促使听者对接收到的信息保持警觉性,并在必要时进行新的、额外的解读,以规避被误导或欺骗的风险。在日常交际中,认知警觉机制是对最佳关联的必要补充,可以有效地帮助交际者避免错误的解读或被有意或无意地误导。因此,尽管认知警觉的提出是建立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之上,但两者互补、紧密相关。

4 认知警觉机制的语言学研究

发展自哲学、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和语言学的认知警觉机制一经提出,由于其强大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就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笔者通过对已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之后发现,学界对认知警觉机制的研究已涵盖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领域。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将着重对认知警觉机制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进行论述。

首先,在语言习得层面,很多学者试图寻找认知警觉机制在儿童身上的运作模式。Matsui 等认为,儿童和大人一样都具有认知警觉能力,可以通过评估两项标准:说话者是否提供真实信息和说话者是否具有善意,来确定能否相信说话者(Matsui et al. 2016: 83)。他们设计2组对照实验,调查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是否用这两项标准来判断说话者的可信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认知警觉包含很多组成部分,且每部分的发展时间各有差异,如3-4岁儿童能判断说话者言语中的确定性,5岁儿童可以根据对说话者的熟悉度调整偏见,而3岁儿童却不能。Stephens 等指出,在儿童早期的

证言学习中,监测言语行为和说话者是认知警觉的两种主要实现手段(Stephens et al. 2015: 151)。儿童在向说话者学习的时候,会遇到两大冲突:知识冲突和兴趣冲突。在应对这些冲突时,早期认知警觉有2种机制:连贯性审查机制(coherence checking)和源头监测机制(source monitoring)。前者指在理解信息过程中,儿童需要将新信息与原有知识进行对比审查,以便发现不一致、不合理、不准确的信息;后者指如果儿童原本没有储备相关知识,他们须要观察说话者,注意说话者的能力和品质,并注意说话者的自信度、一致性、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以及组织成员身份。Cruz 在探究语间语用发展中二语交际的认知警觉机制时提出,二语语用教学须注重理解的元心理意识的培养,以发展或改良学习者的认知警觉,促进解读的可靠性和可信度(Cruz 2013: 117)。此外,认知警觉在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尚不完善或不如本族语者时显得更有必要,因为它可以触发更加复杂的认知加工策略——谨慎乐观主义(cautious optimism),使听者能避免误解。Cruz 对二语和外语学习者的语言失误、认知不公和认知警觉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的结论是,语用失误源于语用无能,进而产生认知不公,即听话者会对说话者的意图、感觉、信任进行错误理解(同上 2014: 34)。但是当认知警觉触发听话者的认知加工策略由朴素乐观主义向谨慎乐观主义转换时,我们就可以避免甚至克服认知不公,从而实现正常的人际交往。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母语习得还是二语习得中,认知警觉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帮助解决冲突、促进理解、规避语用失误等。认知警觉包涵多种成分,每种成分在不同年龄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儿童具有认知警觉机制,早期这种机制发展尚不成熟,但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

其次,认知警觉机制在话语分析领域也取得重要成果。Cruz(2015: 469)探究认知警觉在解读双关语中的作用。认知警觉机制提醒听者注意双关语的幽默意图,促使听者对文本再解读。认知警觉机制还可以触发复杂的加工策略,促使听者重新审阅文本,发现可以被重新解读的文本部分。Oswald 和 Rihs(2014: 133)从认知视角探究政治话语中扩展隐喻(extended metaphor)的修辞和认知优势,发现扩展隐喻可以满足认知警觉的要求并稳固信任感。在传统反移民话语的批评话语分析中,一系列论辩策略被视为话语构成要素,论辩的言后效果被视为基于常识推理方案的语用加工

产物。但 Hart 从认知进化心理学视角提出新的解释。他指出,在反移民话语中复现的论辩模式与两种认知机制相关,即觉察和避免欺骗机制和认知警觉机制(Hart 2013: 200)。反移民话语中的论辩行为产生的潜在言后效果不是意识—推理加工后的产物,而是受这两类机制提供的认知启发和认知偏见作用产生,因此在这两种机制影响下产生的论辩模式以操纵而非说服为特点。Dybko 通过调查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口号发现,认知警觉和关联理论在理解口号的语用意义中起到关键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口号(Dybko 2012: 31)。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认知警觉机制为无论是修辞话语还是批评话语研究都提供一种新视角,并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再次,还有学者对认知警觉机制本体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其实现方式。作为一种广泛适用的抽象概念,认知警觉机制与关联理论一样对诸多现象存在强大的解释力。但是这种认知警觉并非某种单一的机制,而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得以实现。如 Mercier 在探究专家推理时提出,推理是一项认知警觉机制,可以帮助发现和评价论点并更好地解释专家推理或好或坏的表现(Mercier 2011: 313)。Mercier 提出,显化的连贯评价机制是实现认知警觉的一种方式,可用于评价我们取自别人的信息(同上 2012: 81)。Sellevold 则提出,程序表达策略可通过模糊读者的认知环境来规避其认知警觉机制(Sellevold 2014: 96)。

由于认知警觉机制部分源于语言学,所以对语言学中的很多现象存在较强的解释力。已有的研究涵盖母语习得、二语(外语)习得、话语分析、本体研究等。由于认知警觉机制仍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概念,所以无论是语言学领域的纯理论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都尚不广泛。但从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认知警觉机制能给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是对传统语言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拓展。我们可以用这种机制研究其他语言学内容,如幽默话语、反语、二语学习、二语教学、翻译等。

5 认知警觉机制的研究展望

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虽然某些论述遭到质疑(如 Michaelian 2013: 37-59),但依旧引起包括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学者的重视。

首先,认知警觉的组成机制和触发点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和理论层面的探讨。例如, Mercier(2011: 313, 2012: 81)曾提出,推理、连贯

评价都是实现认知警觉的认知机制。而 Sellevold (2014: 96)则提出,程序表达策略可以规避信息接收者的认知警觉机制。此外,人类的警觉呈现弱有效性还是中有效性?正如上文所述,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尚无定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人类的语言现象、心理活动、社会活动等微观和宏观层面入手,进一步探究认知警觉机制的其他组成部分、实现方式等问题。

其次,认知警觉和关联理论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Mazzarella(2013: 20-45)探讨认知警觉机制在最佳关联作为语用标准中的作用; Cruz (2014: 34-50)提出,认知警觉可以触发关联理论中3大解读策略(朴素乐观主义、谨慎乐观主义、复杂理解)的转化。即当认知警觉机制发现说话者不是有能力的语言使用者或者不怀善意的时候,它会由朴素乐观主义转向谨慎乐观主义,听者的解读策略发生更改。

最后,我们可以将认知警觉机制广泛地应用到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用它解释这些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因为认知警觉机制旨在解读交际行为,而交际行为发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说话、阅读、看电影等都涉及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因此都属于交际行为。Hughes 认为,认知警觉可以帮助纪录片制作者维持真理宣言(Hughes 2012: 246); Simon 通过探究网络上信任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指出,认知警觉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透明度”,即为了客观评价认知主体、内容和过程,我们需要能够接触到他们并与之交流(Simon 2010: 343)。所以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只要涉及到交际,我们都值得用认知警觉机制去一探究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验证认知警觉机制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孟建钢.《道德经》英译的关联性研究——以亚瑟·威利的翻译为例[J]. 外语学刊, 2018(4).
- Castelain, T., Bernard, S., Henst, J., Mercier, H. The Influence of Power and Reason on Young Maya Children's Endorsement of Testimony [J].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15(6).
- Cruz, M. P. Epistemic Vigilance, Cautious Optimism and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J]. *Research in Language*, 2012(4).
- Cruz, M. P. Metapsychological Awareness of Comprehension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of L2 Communication in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59).

- Cruz , M. P. Pragmatic Failure ,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 2014(39) .
- Cruz , M. P. On the Role of Vigila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uns [J]. *Humor* , 2015(3) .
- Dybko , K. Relevance Theory , Epistemic Vigilance and Social Slogans [J]. *ANGLICA —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 2012(2) .
- Hart , C. Legitimizing Assertions and the Logico-rhetorical Module: Evidence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in Media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J]. *Discourse Studies* , 2011(6) .
- Hart , C. Argumentation Meets Adapted Cognition: Manipulation in Media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 2013(59) .
- Hendriks , F. , Kienhues , D. , Bromme , R. Evoking Vigilance: Would You Distrust a Scientist Who Discusses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in a Science Blog? [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2016(8) .
- Hughes , H. Scrutiny and Documentary: Hubert Sauper 's *Darwin's Nightmare* [J]. *Screen* , 2012(3) .
- Jacquot , A. , Eskenazi , T. , Saleswillemin , E. , Montalan , B. , Proust , J. , Grèzes , J. , Conty , L. Source Unreliability Decreases But Does Not Cancel the Impact of Social Information on Metacognitive Evaluations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 2015(6) .
- Jaswal , V. K. , Kondrad , R. L. Why Children Are Not Always Epistemically Vigilant: Cognitive Limits and Social Considerations [J].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 2016(4) .
- Mascaro , O. , Sperber , D. The Moral , Epistemic , and Mindreading Components of Children's Vigilance Towards Deception [J]. *Cognition* , 2009(3) .
- Matsui , T. , Yamamoto , T. , Miura , Y. , McCagg , P. Young Children's Early Sensitivity to Linguistic Indications of Speaker Certainty in Their Selective Word Learning [J]. *Lingua* , 2016(175) .
- Mazzarella , D. Optimal Relevance as a Pragmatic Criterion: The Role of Epistemic Vigilance [J]. *Linguist* , 2013(25) .
- Mercier , H. When Experts Argue: Explaining the Best and the Worst of Reasoning [J]. *Argumentation* , 2011(3) .
- Mercier , H.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Explicit Coherence Evaluation [J]. *Mind & Society* , 2012(1) .
- Michaelian , K. The Evolution of Testimony: Receiver Vigilance , Speaker Hones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J]. *Episteme* , 2013(1) .
- Miton , H. , Mercier , H. Cognitive Obstacles to Pro-vaccination Beliefs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 2015(11) .
- Origgi , G. Epistemic Vigilance and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in the Liquid World of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J]. *Social Epistemology* , 2010(3) .
- Origgi , G.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Epistemic Trust , Social Epistemology: A Journal of Knowledge [J]. *Culture and Policy* , 2012(2) .
- Oswald , S. , Rihs , A. Metaphor as Argument: Rhetorical and Epistemic Advantages of Extended Metaphors [J]. *Argumentation* , 2014(2) .
- Sellevold , K. Reading Short Forms Cognitively: Mindreading and Procedural Expressions in La Rochefoucauld and La Bruyère [J]. *Paragraph* , 2014(1) .
- Simon , J. The Entanglement of Trust and Knowledge on the Web [J].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2010(4) .
- Sperber , D. Speakers Are Honest Because Hearers Are Vigilant Reply to Kourken Michaelian [J]. *Episteme* , 2013(1) .
- Sperber , D. , Wilson ,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 1995.
- Sperber , D. , Clément , F. , Heintz , C. , Mascaro , O. , Mercier , H. , Origgi , G. , Wilson , D. Epistemic Vigilance [J]. *Mind & Language* , 2010(25) .
- Stephens , E. , Suarez , S. , Koenig , M. Early Testimonial Learning: Monitoring Speech Acts and Speakers [J].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 2015(48) .
- Truong , T. D. Gender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Re-thinking the Human Rights Framework [J].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 2012(1) .

定稿日期: 2018 - 09 - 11

【责任编辑 王松鹤】